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ISLAMIC INSCRIPTIONS IN QUANZHOU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马松亭

八三年五月

五月廿七

主麻日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بَدَأَ خَلْقَ الْإِنْسَانِ
مِنْ طِينٍ ثُمَّ عَلَّمَهُ
الْقُرْآنَ وَعَلَّمَهُ
أَنْعَمَ عَلَيْنَا اللَّهُ
أَنْ يَرْسُلَ فِيكُمْ
رُسُلًا تَلْقَوْنَ فِيهَا
ذِكْرًا وَبُشْرًا
وَنَذِيرًا وَلَقَدْ
رَبَّاهُمْ فِيكُمْ
أَنْبِيَاءَ مِمَّا قَدْ
ذُكِرَ

مدينة الزيتون

عبد الرحمن ناجونغ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编

*

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15.75印张 36插页 458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

书号：11173·110 定价：10.00元

中文题签 马松亭

阿拉伯文题签 纳忠

211/53

白寿彝教授序

杜环的《经行记》，是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和伊斯兰国家风土的最早汉文记录，吴鉴《清净寺记》和郭嘉《重建怀圣寺记》，是关于中国礼拜寺最早的记录，这都是大家熟知的。还有林之奇《泉州东坂葬蕃商记》（见于《拙斋文集》卷十五），是关于穆斯林坟墓的最早记录，《旧唐书》卷四，记永徽二年“大食国始遣使朝献”，这是关于阿拉伯派遣使者到中国来的记录。《旧唐书》当是根据原始的官方记载，不过所记不一定是原文了。

中国伊斯兰历史文献比较缺乏，史书中的记载很少，散见于墓碑、礼拜寺碑刻和家谱的，数量也不算大，而且需要辨别真伪，不能一概凭信。题为天宝元年的《创建清真寺碑》是很著名的碑记，但确是后人伪造的东西。这篇伪造的东西，在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有它的刻石，在西安化觉巷礼拜寺有它的刻石，而且据旧抄本《如梦录》所记，开封东大寺也有它的刻石。云南玉溪县大营有马德新的墓碑，碑上写着马德新的几个孙子的名字。经过查问，原来这些已经有了名字的孙子，并未出世。所以石刻上的记载也并不完全可信，还要慎重对待。家谱里的记载，有一些有用的东西，也有不少很难置信。我曾经看到赛典赤的家谱十二、三种，单单世系一项，就很难说是否可靠。诸如此类的问题，给我们带来了研究上的很大困难。

泉州有关伊斯兰教的石刻，相当丰富，这是我早已听说过的，但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有关的详细材料。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研读吴鉴的《清净寺记》，曾作跋文一篇，刊于《云南大学学报》第二期。当时苦于不能得到泉州有关的阿拉伯文材料。时隔四十年，得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的这本书，甚为高兴。它不只提供了有关伊斯兰教石刻的材料，而且提出了一些看法，可以与上述的汉文记录相参证，帮助我们对中国早期的伊斯兰教史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碑文的内容、书法和具体的安排，都提供了宗教史、文化史的珍贵材料。今天，大家所说的清净寺是否就是当年的清净寺，作者提出了他的看法。我想这个问题也可以继续研究下去。

我希望以这本书为开端，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都能够陆续汇集起来，编印、出版。这对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于北京

庄为玠教授序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一书出版了，聆悉之后，欣慰非常。数年前，我曾一再鼓励陈达生同志要把泉州遗存的伊斯兰教外文石刻翻译出来，加以考释，编辑成书。不想转眼之间，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领导重视下，这个愿望已成为现实，这是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盛事。

泉州是中世纪知名的世界贸易港，中外文物荟萃，其港史早已有人研究。自1925年张星烺教授访古泉州之后，近六十年来，考古工作有了进展，文献资料积累得更多，还进行了民俗调查，港史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老一辈史学家们的启蒙工作，已经开花结果。1957年，吴文良先生编撰《泉州宗教石刻》，综述泉州各种宗教。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陈达生同志主撰了《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专集，可以说是前者的继续发展。

这部新著对碑文采取原文全译的办法，并附阿拉伯文，提供了碑刻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碑文考证，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宋代清净寺问题，确实必须重新考证，值得认真研究。这些无疑对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是有贡献的。

白寿彝同志在序文中建议全国各地加强外文碑刻的搜集、编印、出版工作，我觉得很有必要，十分赞同。这是老一辈史学家对年轻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老一辈泉州港史专家，大多已经年老体衰，希望寄托在年轻一辈人的身上。《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的出版，正说明年轻的一辈有能力承担这个历史使命。我已年逾古稀，有机会拜读这部著作，心中异常喜慰，特写此序文，希望泉州其他宗教的资料，也能一部部地编印出来。

一九八二年元旦于厦门大学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编

主 撰 陈达生

英文翻译 陈思明

宁夏人民出版社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前 言

泉州位于我国福建省东南沿海的晋江下游，其东南为晋江冲积而成的广大平原，西北地多丘陵。这里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多雨，冰雪罕见。自然资源丰富，农业、手工业相当发达。早在中世纪泉州就与世界各地往来频繁，曾是驰名世界的对外贸易港。

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泉州设州治^①，海外贸易逐渐发展。“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后，中国从西面通往西域的陆路不靖，海路开始发达起来。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唐文宗下令保护岭南、福建及扬州的蕃客，“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保护通商的自由^②。五代时，泉州扩建城垣（公元944年），并开拓街市，设立货栈。“岁丰听卖买，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③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十月六日，诏泉州增置市舶”^④，出现了“泉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⑤的景象。南宋末的泉州海外贸易已齐名于广州。至元代，则更加繁盛，时人称“泉，七闽之都也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⑥其后，由于元末的十年战乱（公元1357—1366年），泉州城市遭破坏，加上明初禁止海外贸易，外商纷纷逃离泉州，从此泉州逐渐走向衰落。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移市舶司于福州。^⑦

来泉州的外商以及各行各业人员，在宋元时期数以万计，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穆斯林。他们和泉州人民和睦相处，参与了当地的各项活动，为繁荣和发展泉州作出了很大贡献。著名的有数代居留广州、后迁泉州的蒲寿庚，他擅蕃舶利达三十年之久，并

^①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泉州》：“旧泉州，本理在今闽县，武德六年置。景云二年改为闽州，开元中改为福州。今泉州本南安县也。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县人孙师业诉称赴州遥远。遂于南安县东北界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改为泉州，即今理是也。”

^②《钦定全唐文》卷七十五《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太和八年，上谕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因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③见《清源留氏族谱》卷三《宋太师鄂国公传》。

^④见《宋会要辑稿》卷一千一百二十四《职官》四十四之八。

^⑤见《宋史》卷三百三十《杜纯传》。

^⑥见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载于《草庐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⑦万历四十年《泉州府志》卷七《版籍志下·杂课》：“成化八年，市舶司移置福州。”

曾担任泉州市舶司的长官。^①又如巨贾佛莲(蒲氏之婿),拥有八十艘海舶^②;外商尸罗围“赏乙于蒲”(指在广州的蒲姓家族)^③。在泉州的穆斯林曾投资修筑泉州城墙^④,捐款造官船^⑤,参与很多公益事业。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也受到当地人民的尊重。他们中有的人还与当地居民通婚,定居于泉州,卒葬于泉州。汉文最早记载穆斯林在泉州建立墓地的,见于林之奇(公元1112—1176年)撰《泉州东坂葬蕃商记》^⑥。穆斯林在泉州建筑清真寺最早的汉文记载见于公元1350年吴鉴撰《清净寺记》^⑦。其他记载穆斯林在泉州活动的汉文史料颇多,恕不在此赘述。

在阿拉伯、波斯的文献中,穆斯林史学家最早记载泉州事者,要论伊本·胡尔达兹贝(Ibn-khurdadzibah,公元830—912年)著的《道程与郡国志》^⑧。其后,地中海西西里岛(Sicily)人爱德利奚(Edrisi)著的《地理书》,称泉州为“蒋库”。^⑨阿伯尔肥达(Abulfeda,公元1273—1331年)的《地理书》称泉州为“刺桐(Zaitun)”。^⑩伊本·巴图泰(Ibn-batuta)曾于公元1345—1346年游历中国,在他的《游记》中已根本不提泉州而代之以“刺桐”,书中描述了泉州的商业、物产盛况,以及生活在泉州的穆斯林情况。^⑪明代以后,由于泉州海外贸易的衰落,刺桐城遂少见于阿拉伯史籍,偶有刺桐城或刺桐港之名,也不知就是泉州,而误作他地。^⑫直至三十年代,由于张星烺、陈万里先生和日本桑原隲藏先生的考证,泉州即中世纪著名的刺桐城才被公认。

近几十年来,在泉州发现大批的各种宗教石刻,其中以伊斯兰教的数量最多,说明中世纪中西方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是穆斯林。由于他们独特的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所到之处无

①见《宋史》卷四十七《瀛国纪》和《闽书》卷一百五十二《泉志》。

②《癸辛杂识》续集下《佛莲家赏》：“泉南有巨贾南蕃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殁，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赏，见有珍珠一百三十石。”

③《程史》卷十一《番禺海獠》：“泉亦有舶獠，曰尸罗围，赏乙于蒲。”笔者按：尸罗围，原文Siraf，今通译为施拉夫。

④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上·城池》：“嘉定四年(公元1263年)，守郃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赏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

⑤《水心先生文集》卷十九《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公墓志铭》：“知泉州晋江县州，分造战船。公曰：‘负郭岂有羨钱耶？何忍敛百姓’，将舍去。诸蕃义公之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

⑥林之奇，福州侯官人，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进士，曾任泉州市舶提举，撰有《拙斋文集》。此书卷十五《泉州东坂葬蕃商记》(载于《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记载试郃围建蕃商公墓，始于绍兴壬午(公元1162年)，成于隆兴癸未(公元1163年)。

⑦此文载于《重立清净寺碑》，见本书图21。

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18页，张星烺译文：“由康府行八日至蒋府(Janfu)，生产与康府相同。”编者按：“蒋府”(Janfu)即“泉府”(Zhuanfu)的转音。

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38页，张星烺译文：“蒋库(Janku)亦在克姆丹河之上，距康府有三日程。此城有制造玻璃业，善织丝货。”笔者按：“蒋库”(Janku)即“蒋府”(Janfu)的误写(译)。阿拉伯文中 k / ق 与 f / ج 的读音表现在字母中仅一点之差。

⑩《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42、244页，张星烺译文：“又云泉州(Shanju, Shinju)，当今又曰刺桐(Zaitun)，为中国诸港之一。”“刺桐(Zaitun)即泉州(Shanju)，中国商港也。”

⑪《阿拉伯世界》总第九期第97—99页，马金鹏译《伊本·巴图泰游记》：“我们漂海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刺桐城。这座城里，甚至连全中国、印度都没有刺桐(油橄榄)，但却以刺桐为名。这是一座宽大城池，出产丝绸也因地而驰名。这里的绸缎比汗沙(杭州)和汗八里(北京、元大都)出产的还要好。刺桐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或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港内停有大船百艘，小船无数……”

⑫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2页。

不留下伊斯兰教的建筑和墓葬等史迹。

泉州发现的伊斯兰教碑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寺建筑石刻，一类为墓葬建筑石刻。教寺的建筑石刻除了现存泉州通淮街的艾苏哈卜寺^①外，还发现其他一些寺的遗留碑刻。这些碑刻的造型和文字内容，证实泉州历史上至少曾存在过七、八座寺。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是建于伊斯兰历400年（公元1009—1010年）、并保存至今的艾苏哈卜寺。

墓葬建筑石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墓碑、塔式石墓盖、祭坛式墓葬石刻和拱北式陵墓建筑门楣石刻。在墓碑中年代记载最早的是伊斯兰历567年（公元1171年）。

有趣的是，这些石刻的雕刻图案，除了云月图案、几何图案为伊斯兰教所特有的以外，其他如花卉、枝叶等等，与泉州发现的古基督教、印度教、佛教、摩尼教等等的石刻图案几乎完全一致。这似可说明中世纪这些代表中西方文明的图案花纹的设计技艺是相互影响的。

石刻的文字以阿拉伯文为主，部分为波斯文和突厥文，有的混刻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于同一碑中。碑文的年代以伊斯兰历法记载，个别的碑用波斯文记录伊斯兰历和中国的农历，其换算之准确令人惊讶。一般碑文只记载死者的姓名、卒时，而不记载生时；有的仅仅雕刻《古兰经》和《圣训》的词句；但是，亦有个别碑用波斯文既记载了生时、年龄，并且注明死者的生肖名称。石刻中阿拉伯文书法种类繁多，有古老的库法体、三一体（大楷）、小楷、草书、花体、波斯体、以及方体（类似中文的篆体）等等。碑文的体裁，一般是记叙文，也有个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的。

碑文明确记载的穆斯林的来源，有来自也门（Yemen）、哈姆丹（Hamdan）、土耳其斯坦的玛利卡（al-malaq）、亚美尼亚的哈拉提（Khalat）、波斯的施拉夫（Siraf）、设拉子（Shiraz）、贾杰鲁姆（Jajarm）、布哈拉（Bukhara）、花刺子模（Khorazm）、霍拉桑（Khurasan）、伊斯法罕（Isfahan）、大不里士（Tabriz）、吉兰尼（Jilan）等地，其中经波斯来的人为数最多。碑文还说明：穆斯林的后裔留居于泉州附近，成为后来的回族。他们发展至今人数最多的要推丁、郭两姓，各拥有一万多人，聚居于晋江县的陈埭和惠安县的白奇。

石刻的发现地点，在泉州仁风门（东门）区域有东头乡、色厝美、仁风街、驿路埔、金厝围、夏厝山、东禅寺、东湖畔、东岳山、灵山、瑞凤岭、乐（鹿）园等等；在通淮门（东南门）区域有津头埔、下围、法石、美山、后路、云麓、苏厝山等等；在南门区域有南校场、华洲、沟后村、亭店乡等等。此外，相当大部分的碑刻是在通淮门、仁风门、南门的城垣中发掘出来的。据考古与史籍记载证明，这些城垣是明洪武（公元1368—1398年）初年建筑的。^②

泉州遗存的伊斯兰教石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国内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尤其

^①建于北宋的艾苏哈卜寺是泉州唯一留存至今的伊斯兰教寺。1507年，有人将元代《清静寺记》碑误立于寺内，造成张冠李戴，后人不明真相，遂以“清静寺”之名称呼艾苏哈卜寺，袭用至今。详见本书图7译文和图21碑文及按语。

^②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泉州府志》卷四《規制志上·城池》：“国朝洪武初，指挥李山，复增高（城墙——笔者注）五尺，基广二丈四尺，凡内外皆甃以石，建月城六。”

可贵的是石刻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记载，可补史籍记载的不足。它对于我们研究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泉州的历史，外国穆斯林在泉州的生活、从事的职业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贸易兴衰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珍贵的资料。它还是我们考证宋、元时期穆斯林的聚居区域、伊斯兰教寺独特的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直接佐证。这些石刻还为研究元末泉州的十年战乱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来泉州的穆斯林学习汉文、使用中国历法、与中国人相互通婚、中外的传统风俗习惯如何互相影响、渗透以及回族如何形成等等，也都在这些石刻中有所表现。

本书收录了已发现的碑刻两百余方。对这些碑刻，本书提供了照片（或拓片），对其来源作了记录，对其造型作了描述，对碑上的外文进行了全文翻译，并附原碑古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现代书写体，以便利读者对照。同时，对碑刻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考证（为不使其与碑的原始资料相混淆，采用了“按语”的方式）。译文中涉及的专有名词以及引文资料出处等，均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的前辈吴文良先生，早年从事多种宗教石刻的搜集和研究，并于1953年把他所搜集的石刻捐献给国家，现在大部分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藏品。在他1957年撰写的《泉州宗教石刻》中，就曾记录了八十多方伊斯兰教石刻，本书已将其全部收录在内。这些石刻的来源记录，以该书为依据；对一些已毁的石刻，本书采用了该书的图片；对尚存的石刻，则根据我们实测的数据，作了描述、介绍，并重新翻译了碑中的阿拉伯文、波斯文。为了统一体例，凡是在译文后面明确注明引自《古兰经》的文句，一律采用马坚先生的译文。译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如〔伊斯兰历〕、〔公元××××年〕以及农历的换算时间，均为笔者所注，非原文所有。

在校译这些碑刻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工作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教研室、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教研室和波斯语教研室、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教研室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得到了叙利亚专家奥贝德先生、埃及专家赫吉兹先生以及马贤、马金鹏、安士伟、叶奕良、郭应德、吕学德、张一飞、林则飞、朱威烈、周顺贤、刘欢、买买提赛来等先生的具体帮助；在撰写过程中，又得到了朱杰勤、庄为玠、徐庄、金宜久、陈恩明、陈高华等老师的指导，陈恩明老师还把此书全文翻译成英文，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笔者仅仅是集众多学者辛勤研究之成果，做了一些整理工作。书中的一些见解，尚不成熟，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此书得以尽快问世，还应当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目 录

白寿彝教授序
庄为玘教授序

前言..... (1—4)

第一部分 伊斯兰教寺建筑石刻

图1	泉州北宋艾苏哈卜寺外景.....	(1)
图2	艾苏哈卜寺透视图.....	(1)
图3	艾苏哈卜寺立面图.....	(1)
图4	艾苏哈卜寺平面图.....	(1)
图5	艾苏哈卜寺正门尖拱门楼.....	(1)
图6	艾苏哈卜寺南围墙阿拉伯文石刻.....	(2)
图7	记载艾苏哈卜寺历史的阿拉伯文纪年石刻.....	(2)
图8	艾苏哈卜寺礼拜殿正门.....	(3)
图9	艾苏哈卜寺礼拜殿正向墙.....	(4)
图10	正向墙米哈拉布石刻.....	(4)
图11	米哈拉布往南第一龕状石刻.....	(4)
图12	米哈拉布往南第二龕状石刻.....	(5)
图13	米哈拉布往南第三龕状石刻.....	(5)
图14	米哈拉布往北第一龕状石刻.....	(5)
图15	米哈拉布往北第二龕状石刻.....	(5)
图16	米哈拉布往北第三龕状石刻.....	(6)
图17	正向墙上额阿拉伯文石刻.....	(6)
图18、19、20	明永乐《勅諭》碑(公元1407年).....	(7)
图21	重立清净寺碑(公元1507年).....	(8)

图22 重修清净寺碑记(公元1609年)	(10)
图23—1.2 伊斯兰教寺门楣石刻	(12)
图24—1.2 元代穆罕默德寺门楣石刻	(12)
图25—1.2 元代纳希德重修寺碑	(13)
图26—1.2 也门人奈纳·奥姆尔建寺碑	(13)
图27、28 伊斯兰教寺门楣石刻	(14)
图29 伊斯兰教寺建筑装饰石刻	(14)

第二部分 伊斯兰教徒墓葬

一、伊斯兰教徒墓碑石刻

图30 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墓碑石	(15)
图31—1.2 曼苏尔墓碑石	(15)
图32—1.2 哈吉·本·艾欧伯克墓碑石	(16)
图33 格兰脱·特勤墓碑石	(16)
图34—1.2 法蒂玛·宾·奈纳墓碑石	(16)
图35 伊本·德贾伯墓碑石	(17)
图36 伯克尔墓碑石	(17)
图37—1.2 艾密尔·赛典赤·杜安沙墓碑石	(17)
图38—1.2 奈纳·穆罕默德墓碑石	(18)
图39 艾克拉伯·奥姆尔墓碑石	(18)
图40 伊斯兰历703年阿拉伯文碑	(18)
图41 侯赛因·本·哈只墓碑石	(19)
图42—1.2 和加·失玛鲁丁墓碑石	(19)
图43—1.2 黄公墓百氏坟墓碑石	(19)
图44—1.2 艾卜伯克尔墓碑石	(19)
图45—1.2 茜琳哈通墓碑石	(20)
图46—1.2 艾哈玛德墓碑石	(20)
图47 努冉萨墓碑石	(21)
图48—1.2 瞻思丁·本·努尔丁墓碑石	(21)
图49 穆罕默德墓碑石	(22)
图50 法蒂玛哈通墓碑石	(22)
图51 赫底澈哈通墓碑石	(22)
图52 伊斯兰历738年阿拉伯文碑	(23)
图53 和加·阿里墓碑石	(23)
图54 纳鲁旺·巴那墓碑石	(23)

图55	侯赛因·易斯马仪勒墓碑石	(24)
图56	哈只·和加·本·哈沙墓碑石	(24)
图57	比哈丁·奥姆尔墓碑石	(24)
图58—1.2.3	艾密尔·吐葛逊墓碑石	(24)
图59	赫底澈·宾·番夏墓碑石	(25)
图60	瞻思丁·穆罕默德墓碑石	(25)
图61—1.2	奉训大夫永春县达鲁花赤墓碑石	(25)
图62	赛义德·布尔托玛的女儿墓碑石	(26)
图63	伊本·奥贝德拉墓碑石	(26)
图64	哈谢兰·易卜拉欣墓碑石	(26)
图65	艾卜·玛斯曼尼墓碑石	(26)
图66—1.2	本·格斡玛丁墓碑石	(27)
图67	哈姆杜·素艾德墓碑石	(27)
图68	奈纳·易卜拉欣墓碑石	(27)
图69~图85	无名墓碑石	(27)

二、伊斯兰教徒塔式墓盖石刻

图86	塔式墓盖的墓葬形式复原图	(31)
图87	古吐不拉·耶阿孤白塔式墓盖顶石	(31)
图88—1.2.3.4	马哈穆德塔式石墓盖	(31)
图89~图99	塔式石墓盖	(32)
图100—1.2	灵山塔式石墓盖群	(34)
图101	三合土结构塔式墓盖	(34)
图102~图105	塔式小型石墓盖	(34)
图106~图110	塔式墓盖座石	(35)
图111~图114	塔式墓盖中层石刻	(37)
图115~图121	塔式墓盖顶石	(38)
图122	雕刻新月图案的塔式墓盖顶石	(39)
图123	潘总领塔式墓盖顶石碑	(39)
图124~图126	塔式墓盖顶石碑	(40)
图127	法蒂玛·宾·哈密迪塔式墓盖残石	(40)
图128~图147	塔式墓盖残石	(40)

三、伊斯兰教徒祭坛式墓葬石刻

图148	束腰祭坛式石墓复原图	(43)
图149	中式祭坛墓葬复原图	(44)

图150 中式祭坛墓葬全景	(44)
图151 法蒂玛中式祭坛墓葬顶石碑	(44)
图152~图156 中式祭坛墓葬顶石碑	(44)
图157、158 束腰祭坛式石墓转角挡垛石刻	(45)
图159 法蒂玛·宾·穆萨挡垛石刻	(46)
图160 杜安沙挡垛石刻	(46)
图161 布哈拉人挡垛石刻	(46)
图162~图195 阿拉伯文挡垛石刻	(46)

四、拱北式陵墓建筑门楣石刻

图196 拱北建筑形式描线图	(52)
图197~图199 尖拱状门楣石刻	(52)
图200 尖弓状门楣石刻	(53)
图201—1.2 门框横楣石刻	(53)
图202 扁宽形门楣石刻	(53)
图203 巨型建筑石刻	(54)

五、灵山圣墓

图204 圣墓陵园全景	(54)
图205 重修墓阿拉伯文碑 (公元1322年)	(55)
图206 郑和下西洋行香碑 (公元1417年)	(55)
图207 夏必第重修圣坟碑 (公元1751年)	(55)
图208 郭拔萃重修圣坟碑 (公元1783年)	(55)
图209 马建纪重修温陵圣墓碑 (公元1818年)	(55)
图210 江长贵重修圣墓碑 (公元1871年)	(56)

六、回族郭姓家族墓葬石刻

图211 伊本·库斯·德广贡墓碑石	(57)
图212—1.2.3.4 郭泰暨陈氏墓葬	(58)
图213 郭铁塔式石墓盖	(58)
图214—1.2 郭奇墓葬	(59)
图215 陈孺人、曾孺人、郭启、郭绍、王氏、李氏塔式石墓盖	(59)
图216—1.2 郭崇儿墓葬	(60)
图217—1.2 郭淑献墓葬	(60)

七、回族丁姓家族墓葬石刻

图218—1.2.3.4 丁善暨庄氏墓葬碑刻……………(61)

图219 丁观保、丁宽、丁敏塔式石墓盖……………(61)

图220 丁福保暨施氏塔式石墓盖……………(62)

参考书目……………(64)

本书英译全文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ook)……………(I—XII, 1—111)

本书所收伊斯兰教石刻中的阿拉伯文、波斯文
(Arabic and Persian from the Islamic inscriptions
in Quanzhou)……………(1—31)

图版(Plates)……………(1—64)

第一部分 伊斯兰教寺建筑石刻

历史上，记录泉州伊斯兰教寺数量最多的是元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吴鉴的《清净寺记》，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①。根据目前所发现的有关伊斯兰教寺的碑刻、遗迹的考证，可以认为，这一历史记载是可靠的。

图1 泉州北宋艾苏哈卜寺外景

艾苏哈卜寺是泉州仅存的一座伊斯兰教寺建筑。位于今泉州市东南部，寺南临通淮街，北依五代、北宋时的护城壕（八卦沟）。

图2 艾苏哈卜寺透视图

图3 艾苏哈卜寺立面图

图4 艾苏哈卜寺平面图

按：图2、3、4系根据1960年泉州市工程建筑公司的测绘图。

图5 艾苏哈卜寺正门尖拱门楼

寺正门开在寺南墙的东侧，门楼的建筑为中世纪（公元十一——十六世纪）阿拉伯世界普遍流行的伊斯兰传统建筑形式。门楼底部用花岗岩石，上部用辉绿岩石混砌而成。楼上狭下宽，基阔660、通高1140厘米。楼顶为平台，平台北墙嵌有两方高24、宽28厘米的花岗岩石，阴刻“月”“台”两大字。正面楼额横嵌一条长约560厘米的花岗岩石刻，浮雕阿拉伯文，译文为：

“真主秉公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众天神和一般学者，也这样作证：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②

通向寺内的甬道由四道巨大的尖拱门组成。第一拱门阔380、高1000厘米，顶部为穹形

^①此文刻于《重立清净寺碑》，全文见本书图21。

^②《古兰经》第三章第18~19节。